

□财经前沿

自愿性披露时期内部控制 缺陷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制造业 A 股上市公司样本为例

韩丽荣 盛 金

〔摘 要〕我国内部控制披露制度于 2012 年正式实施，在此之前已有一些公司自愿披露了内部控制情况，特别是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那么，在自愿性披露时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公司报告自身的内部控制缺陷，这些公司及其所处的环境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对此方面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完善内部控制披露制度。采用 2009 年沪深两市主板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影响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因素，结果显示：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复杂的公司运营状况、兼并重组更加频繁、对内部控制建设投入资源较少等特征，同时，公司受到特别处理、发生过财务报告重述等因素也会迫使管理者披露内部控制缺陷。

〔关键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缺陷；自愿性披露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1ZZ033）；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2012 年度自选项目

〔收稿日期〕2011-11-28

〔作者简介〕韩丽荣，吉林大学商学院暨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盛金，吉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春 130012）

一、引 言

企业内部控制失效或内部控制缺陷是导致财务舞弊的主要原因之一。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披露可以为利益相关者提供财务报告可靠性的附加信息，同时也可以促进企业改善内部控制。美国国会于 2002 年 7 月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该法案规定上市公司应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对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进行报告。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也逐步得到了加强，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和指引。2008 年 6 月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10 年 4 月，五部委再次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等相关文件，2012 年，我国正式实施内部控制强制性披露制度。虽然此前我国仍处在自愿性披露阶段，但是对这一时期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分析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风险因素以及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压力因素，对于内部控制强制性披露制度的完善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最早建立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Krishnan 研究了萨班斯法案实施前审计委员会质量和内部控制缺陷的关系,结果显示,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越好,其内部控制缺陷出现的频率越低。^[1] Ge & McVay 发现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一般与收入确认政策缺陷、权责分离不当、期末报告程序、会计政策缺失及不恰当的会计对账有关;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与上市公司经营业务的复杂性正相关,与公司规模和公司盈利能力负相关。^[2] Doyle *et al.* 以 2002 到 2005 年间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 779 家公司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公司规模小、上市年限短、财务状况较差、公司经营业务复杂、成长迅速、正在经历重组的公司,更容易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3] Ashbaugh-Skaife *et al.* 研究了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经济因素和管理层发现并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动机。^[4] Leone 研究发现,控制风险因素与公司组织结构复杂化、公司重大变革以及公司对内部控制系统方面的投资有直接关系,而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新近财务报告重述、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等相关性不大。^[5]

我国近些年来也出现了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成果。方红星和孙篙探讨了影响交叉上市公司在内地市场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因素,研究发现,交叉上市公司能够受到更严格的市场监管和外部审计监督,因而能够更及时地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和漏洞并加以补救。^[6] 蔡丛光对 2003—2006 年年报中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分部数目及其公司规模是报告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7] 田高良等对 2008 年深市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影响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经济因素及管理者发现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动机。^[8] 刘亚莉等基于治理特征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年成立审计委员会的公司,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公司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更大。^[9]

我国对内部控制缺陷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还缺乏对自愿性披露时期内部控制缺陷影响因素分析的清晰框架。本文注重我国上市公司处于自愿性披露制度这一条件,从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以及发现并披露缺陷的压力两方面的共同影响来研究这一问题,分析存在内部控制的风险因素与发现并披露缺陷的压力因素,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内部控制自愿性披露时期,公司既可以选择对外披露也可以选择不对外披露内部控制的情况。我们观察到的内部控制缺陷是企业存在并披露缺陷的联合结果。一般而言,内部控制情况良好的企业愿意对外披露,而内部控制有缺陷的公司则不愿意对外披露。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内部控制有缺陷的公司自愿选择对外披露缺陷情况呢?总括来看,自愿性披露阶段报告出来的内部控制缺陷是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企业确实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二是这种内部控制缺陷已经被发现,三是企业经过权衡决定对外披露。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是披露缺陷的前提,我们将其概括为内部控制风险因素,风险因素与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及内部控制建设情况有关。发现并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可能与企业受到的压力有关,这些压力来自于企业的外部 and 内部。在这些压力的作用下,企业投入资源去寻找内部控制缺陷,并发现了缺陷,或者这些缺陷是由外部人员发现的,企业经过权衡最终决定对外披露这些缺陷。我们将这些促使企业发现并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因素统称为发现并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压力因素。

(一) 内部控制风险因素

导致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风险因素包括公司运营的复杂性、组织结构变更、企业的快速成长及内部控制建设投入资源不足等因素。运营复杂度高的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更

大,运营复杂度高,将利用更加复杂的处理程序,这将导致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实施更加困难。运营复杂度可以从许多角度进行观察,我们采用子公司数(ZGS)作为替代变量刻画公司运营的复杂度,因为公司内部控制的主要目标是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子公司越多,各子公司经营特点及会计核算方法的差异性可能更大,就会面临更多的合并会计报表问题,内部控制的政策和程序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缺陷。因此提出假设 1:

H1: 公司子公司的数量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存在正相关关系。

公司经历组织结构变革将给内部控制建设带来很大的压力,出现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增大。经历组织结构变革后的公司在运营、新系统的构建和维护、企业文化的建设等方面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组织规模变大的公司,公司资产的规模将会增加,对于资产、人员等资源的组织协调将变得更加复杂,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的漏洞可能增多;组织规模变小的公司,由于人员缩减,内部控制人员缺乏,职责分工可能变得不再明确,监督制度可能出现弱化等问题。组织结构变革一般是通过兼并和重组方式进行的,我们采用兼并和重组(JHC)的 0-1 变量来表示上市公司近期是否经历组织结构变革,变量值等于 1 表示公司近期经历了兼并和重组,反之为 0。因此提出假设 2:

H2: 兼并和重组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存在正相关关系。

公司的成长速度也会对内部控制风险产生影响。公司成长越快,各项配套的规章制度可能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内部控制出现漏洞和缺陷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公司可能会因为迅速的成长而面临组织结构变化以及运营更加复杂,就很可能面临上面所提到的一系列问题。发展速度更快的公司与其他公司相比,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可能性更大。我们采用销售增长率(CZ)衡量企业的成长速度。因此提出假设 3:

H3: 公司销售增长率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存在正相关关系。

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是建立在有效的信息和控制系统之上的,而信息和控制系统的建设具有较高的初始投入固定成本和日常维护的变动成本。公司基于自有资源以及对内部控制的需求选择内部控制建设中所投入资源的多少。通常资产规模较大、财务状况较好的公司更有可能投入较多的资源去建立和维护较复杂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本文度量公司规模以及财务状况的指标选取的是上市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GM)以及 Altman 提出的 Z-score 模型(Zscore)^[10]。因此提出假设 4 和假设 5:

H4: 上市公司总资产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存在负相关关系。

H5: 公司财务状况 Z-score 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存在负相关关系。

(二) 发现并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压力因素

发现并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压力因素包括外部审计、前期财务报告重述、股权集中度以及公司被特别处理等因素。

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被认为是促使企业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一个重要压力因素,高质量的审计会有更大的可能性去发现并要求管理者披露自身的内部控制缺陷。审计质量往往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衡量,DeAngelo 指出以客户数量衡量的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从每位客户获取的审计准租金占总的审计准租金的份额越少,失去某位客户对审计师的影响越小,审计师的独立性越强,审计质量越高。^[11]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投资于如何发现内部控制缺陷的技术和对员工进行相关的培训,同时大规模会计师事务所为避免诉讼成本就会给企业更大的压力去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我们采用“四大”即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和安永(SD)的 0-1 变量,来代表外部审计质量,变量为 1 代表“四大”,反之为 0。因此提出假设 6:

H6: 公司聘用“四大”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存在正相关关系。

前期财务报告重述给管理者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带来很大的压力。Richardson 的研究表明, 当公司发生收入重述时, 公司将遭受一个平均为 25% 的股价减值。^[12] 我们预期如果公司上一年发生过财务重述, 管理者可能会担心遭受市场的惩罚, 那么他将有强烈的动机去避免惩罚再次发生, 因此他将更加希望通过努力发现并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以降低财务报告重述风险。本文采用财务报告重述 (CS) 来表示公司是否在前一期发生过财务报告重述, 变量取 1 代表发生过重述, 反之为 0。因此提出假设 7:

H7: 公司前一期财务报告重述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存在正相关关系。

公司的股权特征也会影响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 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可能会对管理者直接监管更加有效, 会增加管理者发现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压力。Jensen, Shleifer & Vishny 指出股权集中度较高公司的控股股东, 对管理者监督更强, 当出现控制问题时给予管理者的压力更大, 这对管理者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产生了强烈的激励。^[13-14] 本文采用公司治理 Z 值, 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 (Z) 来表示股权集中度。因此提出假设 8:

H8: 公司股权集中度 Z 值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存在正相关关系。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 上市公司面临着被特别处理或退市的风险。遭受特别处理的公司会受到较多的关注, 公司出现运营或者财务方面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因而存在较高的诉讼风险。管理者通过披露内部控制缺陷, 希望将诉讼风险降到最低。特别处理将会给管理者发现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带来更大的压力, 本文使用特别处理 (ST) 表示公司遭受了特别处理。因此提出假设 9:

H9: 公司受到特别处理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存在正相关关系。

总之, 本文认为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是内部控制缺陷存在的风险因素以及发现并披露的压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针对风险因素和压力因素分别提出了假设 H1—H5 和 H6—H9, 并且分别进行检验。

三、实证分析

(一) 数据选取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剔除行业因素的影响,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 2009 年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所有主板 A 股的制造业 (根据证监会行业代码) 上市公司, 得到总体样本 667 家。样本组选取的是 2009 年年度报告在公司治理章节中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 共计 221 家, 其他 446 家作为控制样本。本文所采用的年度报告数据来自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经过手工下载整理获得, 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锐思数据库以及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整理获得, 本文所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 Stata 10.0。

本文对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分析的结果大部分符合我们所做出的假设。统计结果显示, 在内部控制风险因素方面, 相较于没有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公司, 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拥有的子公司数量更多, 经历的兼并与重组更多, 规模更小, 财务状况更差, 但是公司的成长速度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而在发现并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压力因素方面, 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具有更多的前期财务报告重述, 经历了更多的特别处理, 但是是否聘用“四大”的审计师以及公司股权集中度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却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 除了子公司数与兼并重组的组织结构变更活动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系数 0.360 外, 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约都在 0.2 以内, 所以可以认为我们研究的变量对所研

究的问题具有较高的解释力。

经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判断,相较于没有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来说,披露缺陷的公司具有更高的控制风险与披露压力。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均值	标准差	25% 分位数	中值	75% 分位数
内部控制 风险因素	子公司数	控制组	9.58	9.98	3.00	7.00	12.00
		样本组	14.03 ***	19.14	4.00	9.00	15.00
	兼并和重组	控制组	0.54	0.50			
		样本组	0.75 ***	0.43			
	成长速度	控制组	0.11	0.92	-0.17	0.00	0.16
		样本组	0.12	1.10	-0.16	-0.01	0.16
	公司规模	控制组	60.76	15.10	12.40	25.04	52.67
		样本组	56.87 **	10.62	8.41	18.20	47.81
	Zscore	控制组	2.21	1.94	1.44	2.16	2.94
		样本组	1.51 ***	3.06	1.07	1.72	2.68
发现和披露的 压力因素	是否“四大”	控制组	0.06	0.23			
		样本组	0.03	0.18			
	财务报告重述	控制组	0.07	0.26			
		样本组	0.11 **	0.32			
	公司治理 Z	控制组	10.98	21.04	1.50	2.79	9.57
		样本组	11.35	22.55	1.53	2.63	8.49
	特别处理 ST	控制组	0.17	0.37			
		样本组	0.24 ***	0.43			

注:表中*、**、***分别代表 t 检验在 0.1、0.05、0.01 水平下显著。在描述性统计分析中为了考虑统计结果的经济意义,我们对于规模变量采用的是总资产价值,单位为亿元。而在后面的回归分析与弹性分析中为了量纲的考虑采用了总资产自然对数。

表 2 相关性检验表

		A	B	C	D	E	F	G	H	I
子公司数	A	1.000	0.350 **	0.017	-0.059	-0.036	0.030	-0.029	0.038	-0.051
兼并和重组	B	0.228 **	1.000	-0.018	0.019	-0.019	0.056	0.014	0.070 *	-0.054
成长速度	C	0.222 **	0.015	1.000	0.123 **	0.218 **	0.014	0.002	-0.073 *	0.100 **
公司规模	D	-0.045	0.011	0.049	1.000	0.077 *	0.279 **	0.039	0.046	-0.018
Zscore	E	-0.049	-0.054	0.052	0.153 **	1.000	0.048	-0.055	0.023	-0.021
是否“四大”	F	-0.010	0.056	0.004	0.316 **	0.033	1.000	0.028	0.038	-0.038
财务报告重述	G	0.008	0.014	0.045	0.046	-0.003	0.028	1.000	0.029	-0.068 *
公司治理 Z	H	0.126 **	0.064 *	0.099 **	0.027	0.024	-0.005	0.064 *	1.000	-0.110 **
特别处理 ST	I	-0.061	-0.054	0.030	-0.035	-0.001	-0.038	-0.068 *	-0.103 **	1.000

注:表中*、**、***分别代表 t 检验在 0.1、0.05、0.01 水平下显著。表格对角线上侧为 Spearman 检验,下侧为 Pearson 检验。

(二) Logistic 回归分析

我们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1、模型 2 分别表示为:

$$LN\left(\frac{P}{1-P}\right) = \beta_0 + \beta_1 ZGS + \beta_2 SJHC + \beta_3 CZ + \beta_4 GM + \beta_5 Zscore + \varepsilon$$

$$LN\left(\frac{P}{1-P}\right) = \beta_0 + \beta_1 ZGS + \beta_2 SJHC + \beta_3 CZ + \beta_4 GM + \beta_5 Zscore + \beta_6 SD + \beta_7 CS + \beta_8 Z + \beta_9 ST + \varepsilon$$

表 3 Logistic 回归分析

预测符号			估计系数	
			模型 1	模型 2
截距项			0.32 (0.20)	-0.601 (-0.36)
内部控制 风险因素	子公司数	+	0.015** (2.43)	0.017*** (2.60)
	兼并和重组	+	0.847*** (4.50)	0.890*** (4.66)
	成长速度	+	-0.325 (-1.33)	-0.394 (-1.56)
	公司规模	-	-0.072** (-2.25)	-0.377** (-2.45)
	Zscore	-	-0.101*** (-2.60)	-0.100*** (-2.60)
发现并披露的 压力因素	是否“四大”	+		-0.507 (-1.10)
	财务报告重述	+		0.581** (1.99)
	公司治理 Z	+		-0.001 (-0.25)
	特别处理 ST	+		0.629*** (2.91)
χ^2 检验			51.6***	64.73***
伪 R^2			0.060	0.075
样本容量			1132	1132

注：表中*、**、***分别代表 t 检验在 0.1、0.05、0.01 水平下显著。

模型 1 只使用了内部控制风险因素变量，以便与含压力因素变量的模型 2 进行对比分析。从模型 1 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子公司数和兼并重组变量与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具有更复杂的公司运营以及经历过组织结构变更的公司更倾向于披露自身内部控制缺陷，这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同时，公司规模、财务状况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支持了我们关于公司对内部控制投入资源越少、内部控制风险越高的假设。但是，结果显示我们用销售增长率代表的成长因素并不十分显著，这可能由于自愿性披露阶段，成长较快的公司为了吸引投资，更快发展，并不愿意披露自身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模型 1 的整体评价指标 χ^2 检验值和拟合优度伪 R^2 值都表明模型具有合理性。

模型 2 中则加入了发现并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压力因素指标。加入压力指标后内部控制风险因素指标仍与预期相一致，解释力也没有下降。回归结果显示：财务报告重述与公司内部控制缺

陷披露存在正相关关系，公司受到特别处理 ST 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但是回归结果还表明，代表审计质量的指标是否“四大”、代表股权集中度的指标公司治理 Z 值与内部控制缺陷不存在相关关系，不符合我们的假设。可能的原因是“四大”对企业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施加的压力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相比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股权的集中程度也未对企业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带来影响。模型 2 的整体评价指标 χ^2 检验值和拟合优度伪 R^2 值也都表明模型比较合理并且优于模型 1。

（三）弹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前面我们做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分析，但是在具体的研究问题当中还不能忽略经济意义上的显著性。我们对模型 2 进行弹性分析，研究自变量在特定水平下变化 1% 所引起的因变量变化的百分比，把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概率表示为 $p = \pi(X) = e^{\beta X} / (1 + e^{\beta X})$ 。为了便于进行弹性分析，我们把自变量向量 X 定义为总体的均值水平，计算得出均值状态下 p 值为 0.028%。弹性值表示为：

$$\partial p / \partial x_i \cdot x_i / p = \partial \pi(X) / \partial x_i \cdot x_i / \pi(X) = \beta_i x_i (1 - \pi(X))$$

这里的弹性值仍然表示自变量在均值水平下计算出来的结果，在表 4 中列示。结果显示，在内部控制风险因素中公司规模指标弹性值为 -8.147，在所有变量中最高，而子公司数、兼并和重组、Zscore 也分别达到了 0.187、0.538、-0.198；在发现并披露的压力因素中，特别处理 ST 为最大弹性值 0.12。

为了使结果更直观，我们做了分位数变化的概率分析，在控制其他自变量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自变量 x_i 由 25% 分位数变化为 75% 分位数引起的披露概率 $p = \pi(X)$ 的变化。以上结果都在表 4 中列示。值得说明的是，本文选取的 0-1 变量中，部分变量由于分布特征所限导致 25% 分位数与 75% 分位数相同，为了使分析存在意义，分析中的 0-1 变量的分位数变化值均为由 0 变至 1 的分析结果。

表 4 弹性分析

		预测符号	均值水平弹性	分位数变化值
内部控制 风险因素	子公司数	+	0.187	0.042%
	兼并和重组	+	0.539	0.088%
	成长速度	+	-0.065	-0.033%
	公司规模	-	-8.147	-0.020%
	Zscore	-	-0.198	-0.031%
发现并披露 的压力因素	是否“四大”	+	-0.024	-0.065%
	财务报告重述	+	0.050	0.036%
	公司治理 Z	+	-0.011	-0.068%
	特别处理 ST	+	0.118	0.065%

由弹性分析可以看出，在内部控制风险因素方面，公司规模成为影响公司内部缺陷披露的主要因素，而且可以看出公司规模越大、财务状况越好就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内部控制的建设与维护中，从而降低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公司子公司越多、近期经历兼并重组等组织结构变更，就更可能存在内部控制缺陷问题，从而导致缺陷的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压力因素方面，公司是否 ST 成为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主要压力因素，公司 ST 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且存在较高的诉讼风险等成本，迫使管理者披露公司内部缺陷；公司上期存在财务报告重述，则管理者

有更大的压力去避免重述风险的发生，从而主动选择披露内部控制缺陷。

为了测试模型的稳定性，说明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在模型 2* 中用总资产的增长率代替了销售增长率，在模型 3* 中用前五大股东比例代替了公司治理 Z 值，在模型 4* 中用国内的“八大”会计师事务所代替“四大”，检验结果由表 5 列出。结果显示，除了模型 3* 和 4* 中的公司规模变量、Zscore 变量出现了显著性变化外，其他变量都只存在微小的变化，该结果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此模型得出的实证结果是可靠的。

表 5 稳健性检验

		参数估计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截距项		-0.601 (-0.36)	0.084 (0.05)	-0.72 (-0.43)	-0.13 (-0.08)
内部控制 风险因 素	子公司数	0.017*** (2.60)	0.018*** (2.64)	0.017** (2.54)	0.018*** (2.66)
	兼并和重组	0.890*** (4.66)	0.887*** (4.66)	0.896*** (4.69)	0.878*** (4.60)
	成长速度	-0.394 (-1.56)		-0.358 (-1.39)	-0.394 (-1.55)
	公司规模	-0.377** (-2.45)	-0.071** (-2.95)	-0.016*** (-3.04)	-0.058** (-2.38)
	Zscore	-0.100*** (-2.60)	-0.105*** (-2.72)	-0.100*** (-2.60)	-0.098** (-2.55)
	销售收入增长		-0.036 (-0.38)		
	是否“四大”	-0.507 (-1.10)	-0.492 (-1.07)	-0.468 (-1.01)	
	财务报告重述	0.581** (1.99)	0.579** (1.98)	0.579** (1.98)	0.578** (1.98)
发现并披露 的压力因 素	公司治理 Z	-0.001 (-0.25)	-0.001 (-0.24)		-0.001 (-0.23)
	特别处理 ST	0.629*** (2.91)	0.598*** (2.78)	0.613*** (2.84)	0.631*** (2.92)
	前五大股东			-0.760 (-1.19)	
	“八大”				-0.109 (-0.62)
χ^2 检验		64.73***	61.71***	66.08***	63.83***
伪 R^2		0.075	0.072	0.077	0.075
样本容量		1132	1132	1132	1132

注：表中*、**、***分别代表 t 检验在 0.1、0.05、0.01 水平下显著。

四、结 论

本文探讨了自愿性披露时期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因素，我们将这些因素分为两大方面进

行研究,一是内部控制缺陷存在的风险因素,二是发现并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压力因素。研究发现,从内部控制的风险因素来看,披露自身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存在着更复杂的运营系统、最近经历了更多的组织结构变更、对内部控制建设投入了较少的资源,但是公司的成长速度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发现并披露内部控制的压力因素来看,前期发生过财务报表重述、经受过特别处理的公司更有可能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但是公司的审计师是否为“四大”、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些发现说明,自愿性披露条件下,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企业内部控制缺陷,但是,这种暴露可能尚不充分。进一步,我们推测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从自愿性到强制性的转变将会提供更为有效的信息,也会对投资者的保护进一步加强。

本文存在的不足是:对内部控制缺陷的界定是从企业内部控制自我评价中进行分析得出的,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并且没有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分类,未分别考察不同性质缺陷的特定影响因素;另外自愿性披露阶段,能够观察到的内部控制缺陷是存在与披露缺陷的联合结果,我们没有区分未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公司与未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这使得我们的研究具有局限性,随着内部控制强制性披露制度的实施,这些问题将得到解决;本文实证部分只采用了制造业 2009 年的数据,限制了本文结论的使用范围。

[参考文献]

- [1] Krishnan J. Audit committee and internal control: A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5, 80 (2): 649 - 675.
- [2] Ge W-L, McVay S. The disclosure of material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after the Sarbanes-Oxley act. *Accounting Horizons*, 2005, 19 (3): 137 - 158.
- [3] Doyle J, Ge W-L, McVay S. Determinants of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7, 44: 193 - 223.
- [4] Ashbaugh-Skaife H, Collins D W, Kinney W R Jr. The discovery and reporting of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prior to SOX-Mandated audit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7, 44: 166 - 192.
- [5] Leone A J. Factors related to internal control disclosure: A discussion of Ashbaugh, Collins, and Kinney (2007) and Doyle, Ge, and McVay (2007).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7, 44: 224 - 237.
- [6] 方红星、孙篙 《交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影响因素与市场反应——基于兖州煤业的案例研究》,《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10 年 1 期。
- [7] 蔡丛光 《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分析》,《财会研究》,2010 年 4 期。
- [8] 田高良、齐保垒、李留闯 《基于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影响因素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0 年 4 期。
- [9] 刘亚莉、马晓燕、胡志颖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基于治理特征的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2011 年 5 期。
- [10] Altman E. Financial ratios, discriminant analysis, and the prediction of corporate bankruptcy. *Journal of Finance*, 1968, 23: 589 - 609.
- [11] DeAngelo L.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1, 3: 183 - 199.
- [12] Richardson S. Earnings quality and short sellers. *Accounting Horizons*, 2003, 17, Supplement: 49 - 61.
- [13] Jenson M C. The mod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it, and the failure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Journal of Finance*, 1993, 48: 831 - 880.
- [14] Shleifer A, Vishny R W.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52: 737 - 783.

[责任编辑: 赵东奎]